

八十回憶

(三)

● 孫雲燾（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中華藥學會名譽理事長）

考試引用法國制度

在民國二〇年代，上海工商業發達，形成全國文化，經濟重鎮，正是十里洋場，社會繁榮進步，乃成為國際間聞名的上海市。那時上海人口總數已超過四百萬而不到五百萬人的數目。從前上海醫學校有上海醫學院，聖約翰大學醫學院，震旦大學醫學院，同濟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和東南醫學院等多所，但是藥學校祇有中法大學藥科一校。中法藥科校址設在舊亞爾培路，對面就是逸園跑狗場（與跑馬場相似），不遠的地方又有回力球場（Hurling，一種西班牙技藝）都是賭錢的地方，幸好我對賭博不感興趣，不然便很容易迷失了。所幸距校約二〇〇公尺處就有一座「明復圖書館」。該館特別注重自然科學方面藏書，環境幽靜，我特別喜愛到那裡去看書。民國初期第一代學人如胡明復，胡剛復以及秉志等人自美學成回國後，便組織「中國科學社」，倡導自然科學研究。胡氏兄弟並在上海創辦「大同大學」著重數理科學教育。同時又創立「明復圖書館」，對於提倡自然科學研究和推展科學資訊工

作，發生很大影響。及至民國二〇年代，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第二代學人如李國鼎氏等便發起組織「中華自然科學社」上海方面我和中法大學藥科同學顧學裴氏以及上海醫學院幾位同學就參加中華自然科學社（內分理化組，生物組，醫藥組等）為社友。後來，我去法國進修，便擔任法國方面聯絡人，德國方面由盛彤笙氏任聯絡人，英國方面則由李國鼎氏為聯絡人。可惜中華自然科學社的活動後來受到對日抗戰的影響而告停頓。從前在上海設置的科學研究機構有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北平研究院藥物研究所，英人創辦的雷斯德研究所（Lister Institute）和日人創辦的中華自然科學研究所等。日本人把應該退還的庚子賠款並未償還給中國政府，卻把部分賠款應用在上海楓林橋地方成立一所「中華自然科學研究所」。其目的乃為響應日本政府南進政策做一些特殊科學研究工作。所中也設有藥物研究部（由中尾萬三博士主持）從事中藥研究，所收藏的藥用植物標本頗為豐富。曾廣方博士就是跟隨中尾萬三氏做有關中藥荒花的成分研究。

我國高等藥學教育肇始於民國前四年（一九

〇八年）清代光緒卅四年，北洋軍醫學堂首先成立藥學科。一九二二年以後軍醫學堂改名為軍醫學校。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改稱為今名國防醫學院，設有藥學系。民國初年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醫科分為醫學、藥學二門。修習年限，醫學門定為四年，藥學門定為三年。民國元年，江蘇、浙江、廣東等省均開始設立公立醫學專門學校，其中僅浙江省醫學校兼辦藥科，定名為浙江公立醫藥專門學校，校址設在杭州。修業年限：醫學科預科一年，本科四年；藥學科預科一年，本科三年。自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教育部先後頒布大學法以及訂定藥學專科以上課程。最初藥學課程係參考日本藥學校課程擬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藥學教育為三年制，直至戰後始改為四年制。教育部於民國卅六年修訂藥學課程時，曾徵詢藥學教育學者以及專家意見慎重研討修訂，所訂課程內容包括歐美、日本等國四年制藥學課程的各科科目。有人批評這項修訂的課程表似覺龐雜，繁重。教育部於民國五十四年再修訂藥學院系課程表。嗣後每十年修訂一次以符實際需要。

中法大學藥科於民國十八年在上海成立，首先採取四年學制，此為中國高等藥學教育學制由三年近入四年的新階段。迨民國廿四年在南京成立國立藥學專科學校為獨立的藥學專科學校，亦係四年制。嗣後教會學校如山東齊魯大學醫學院及華西大學理學院先後成立藥學系。及至抗戰勝利後，瀋陽的前南滿醫學院藥科改為國立瀋陽醫學院藥學系。此外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國立浙江大學理學院及國立上海醫學院等院校都增設藥學系。在民國廿五年時，全國計有大學藥學系及專科學校十所。

中法大學藥科雖然規定肄業年限為四年，但是加上六個月的校外實習，實際肄業年限當為四年半。在半年實習期間內，還需參加四次畢業考試，分別重考四學年中每一學年的重要課程。至於教學課程乃是依照教育部規定課程再參考法國藥學院課程釐訂的，可算是相當完備。如在藥品鑑定、毒物檢驗、法藥學（Forensic pharmacy）以外，還加列食品分析、水質學（Hydrology and Water Analysis）等課程。至於考試方式則完全引用法國制度：就是期中考試採取筆試，大考則採用口試。許多學生常因考試（口試）不及格而留級或被開除。

我真佩服宋梧生老師的能耐，他有勇氣把一部分法國教育制度如課程和考試方法等引用到私立中法大學藥科來，居然行得通，沒有學生站出來反對，也真是異數。宋梧生老師更別出心裁，在我們畢業時，不僅頒發一張中文畢業證書（教育部蓋印的），還特別發給另一張拉丁文畢業證

書作為紀念，讓中外人士都大開眼界。後來我到法國進修，才發現那張拉丁文畢業證書的用處。

宋梧生老師在法國專攻內科醫學，但對有機化學、藥化學的造詣頗深，極為Prof. Grignard（曾得諾貝爾化學獎）所賞識，特將宋梧生老師借調到他的實驗室去工作，終成為Prof. Grignard的入門大弟子。宋梧生老師回國以後，除創辦中法大學藥科外，還擔任宏恩醫院院長，中比鑛錠院院長，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中法、中比文化基金會委員等職。他一人身兼許多重要職務，實在忙迫異常，以致無暇再做研究工作，十分可惜！我在中法大學藥科畢業後，除修讀法文準備出國外，還從事研究防治黑熱病的有機銻化合物的合成，由於所製各批成品的毒性尚不穩定，也常向宋梧生老師請益。再有北平研究院藥物研究所設在中法大學藥科大廈的五樓。主持人趙承嘏博士（石民，Dr. C. C. Chao）研究延胡索（Corydalis）甚有成就，對於植物成分的化學構造式和藥理作用諸多問題也常請教宋梧生教授。

分發實習不敢懈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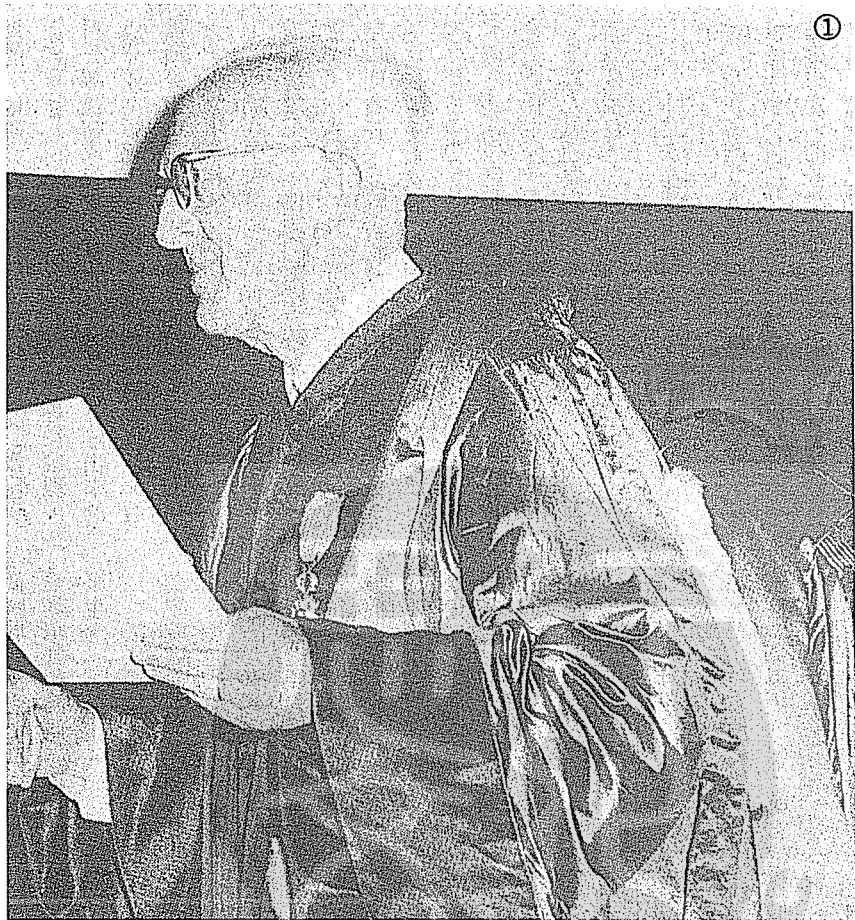
我們到南京衛生部實習時間是從民國廿三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整整六個月。我們於七月一日向衛生部報到當天，即由孟目的技正（主任）帶領著去晉見劉瑞恒部長（Dr. J. H. Liu）。我們實習學生四人分成二組，每組二人分發到衛生部化學室和中央醫院藥局去實習三個月。在實習期間內也去醫政司見習瞭解藥事行政，管

理事項。此外，參觀衛生部和中央衛生實驗院的有關研究部門。查民國十七年及三十六年國民政府兩度公布的衛生部組織法，都規定衛生部設置醫政司、藥政司、防疫司、保健司、地方衛生司及總務司等。可惜因為當時沒有適當的藥政司司長人選，以至未成立藥政司，有關藥政事項歸醫政司兼管。當民國廿二年我們前往衛生部實習時，那時衛生部已有相當建樹。衛生部大廈連同中央衛生實驗院及中央醫院等衛生機構聯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新園區，座落在靠近南京中山門的黃埔路上（在中央軍校隔壁），很為壯觀。民國廿三年十月在南京舉行第九屆遠東熱帶病醫學會議，有遠東國家及歐美各國代表五百餘人參加。會中提出各類論文有關傳染病、熱帶病、公共衛生、微生物學、藥理學、藥學及生物化學等論文計二〇三篇，就中半數以上係中國代表所提出，受到與會專家的重視。

我們中法大學同學前去實習的衛生部化學室是在衛生部大廈內。化學室負責有關藥品檢驗、衛生檢驗的研究工作。像南京下關地方發生食鹽含鉍中毒事件就是由化學室檢驗出結果來而公布的。我們跟著做各項檢驗工作，勤奮艱勉，不敢稍有懈怠。衛生部所訂實驗室管理規則很嚴，工作人員不可在實驗室內會客，吸菸、飲茶、看報紙等等。大廈走廊上放置飲水器、拿臘紙杯飲水。這在當時相當守舊的南京社會，算是創舉。衛生部那時還附設藥物研究室和製藥研究室兩處。藥物研究室由劉紹光博士主持。劉氏是研究藥

②作者孫雲燾教授（左）與簡多惠博士（右）在華府美國藥品食物總署留影。

①作者一九三六年在法國里昂大學進修時的指導教授。



理的。他研究麻黃，分離得副麻黃鹼（pseudo-ephedrine）以及若干中藥成分。他專長藥理，對分離植物成分實非其所長。有時所分離出來的成分並不精純，以致影響藥理作用的正確性。製藥研究室由馮志東氏主持，他研究大風子酸酯類之製備等項工作。

我們在中央醫院藥局實習，參加他們藥劑製備和調劑工作。他們調配處方藥品時切實認真，需經另一人稽核，發藥時還需再稽核一次，並簽字以明責任。我還被指派去做糠皮浸膏（Rice-Poising Extract）和丙種維生素濃縮浸液（Vitamin C Concentrated Extract）的製備工作。衛生部化學室和中央醫院藥局兩處都由孟目的技正擔任主任。孟氏對藥劑學有豐富的實際經驗。他為人風趣而幽默，後來出任南京國立藥學專科學校校長。

赴法進修榮獲博士

我在民國廿五年六月啟程前往法國進修。學校的獎學金包括赴法旅費、治裝費，旅法時期（年限未定）的學雜費等。當時出國尚無民航飛機航行，需要乘坐郵輪。承蒙宋梧生教授厚愛，替我訂了法國郵船公司 Felix Roussel 號郵輪的二等經濟艙位。從上海到法國南部港口馬賽，需經四十天航行。沿途經過香港、新加坡、西貢、可倫布（斯里蘭卡）、吉波地（法屬北非）、賽得港（埃及）等處港口，都停留一天半日，可以下船遊覽。船上設備豪華，每天用餐五次，週末都有盛餐晚會。二等經濟艙和頭等、二等艙畫成一

個區域，倍受優待。這四十天的旅程，簡直與搭乘豪華郵輪渡假旅行一樣，真是十分享受，快慰平生。

抵法國後便辦理申請入學手續。里昂大學醫藥學院因無前例，不允許我進入研究院博士班。我於是向法國教育部申請准予入研究院攻讀。附上中法大學藥科所發的拉丁文畢業證書，證書上列明修讀課程種種，表明我們的學制和修習課程均符合法國藥學院的規定。於是法國教育部特別授權里昂大學醫藥學院舉行確認考試（口試包括重要藥學專門課程及藥品分析的實驗考試）以定取捨。我終於通過了特種確認考試獲准進入研究院攻讀。

法國的教育制度有其特殊地方，如全國大學都是國立大學，原則上每一省僅有一所大學。在一九三五年時，首都僅有巴黎大學一所，Rhone 省亦僅有里昂大學一所。後來學生人數增加，到了一九八五年，巴黎大學便增加到八所分校，里昂大學也有三所分校了。中學生經過會考及格後，便無需再經入學考試，就可按照自己願望進入任何一所大學就讀。一般大學學科採取選讀證書（certificat）制，不受年級限制，只要修畢規定三張證書，即可換取一張大學（學士）文憑（diploma）。大學裡教授講課採取公開自由方式，所以任何人都可前往大學聽講，無需繳費註冊。不過正式生必需經註冊後才有參加考試資格。學期中的小考（期中考）採用筆試方式，大考則採取口試方式。教授上課雖不點名，但正式生如不來聽講，便很難得考試及格（尤其是大考口試

）。每種課程的大考（期末）口試雖是由學生用抽籤方法選定四、五題來答覆，但教授隨後會就有關問題再加發問，也無所謂考試範圍的設限，口試分數佔學期總分的比例較大，假如口試失敗了而不能及格，也無申辯餘地，也不能補考，就祇好重修了。至於實驗課程則必需參加，不可缺課。藥學院則規定四學年的課程全部是必修科，所以無法縮短修業年限，較為嚴格。

關於研究院的修讀方式，我們除聽課，進圖書館查資料外，每週五天半的時間都在實驗室工作。有些實驗必需在當天完成的就要延長到晚上十時左右才能離開實驗室。最後博士論文（答辯）考試規定在大學會議廳舉行，由五位教授擔任評審委員，大約論文考試需經整個上午方始完畢。當舉行論文考試時必需邀請學界人士，親朋好友來參加聽證。如係外國學生，還需邀請其國家駐法外交使節參加，儀式很是隆重。

在我獲准進入研究院攻讀後，便選定 Prof. Leullier, Prof. Revod 二位做指導教授。他們的意見，認為自一九三五年發明磺醯胺藥品（sulfonamide）以來，這類新型藥品衍化物的發展極有前途。對於研製這類新型藥品及測定其新陳代謝作用是一項值得研究的課題。於是我便決定了研究方向，針對磺醯胺問題去作探討。研究的重點放在（一）製備新型磺醯胺藥品，（二）測定各類磺醯胺藥品在豚鼠體內的新陳代謝作用。當時還沒有所謂藥品代謝學研究（Pharmacokinetic Study）這項新名詞，我們祇稱這項研究為「磺醯胺藥品在豚鼠體中之代謝作用研究」。



① 右起：顏春輝、劉瑞恒，後左許子秋一九五五年在新加坡合影。
② 一九四六年劉瑞恒與衛生署長金寶善合影。

我向指導教授說明我從前曾做過有關有機鎳化合物的合作研究，希望有機會再做一點這方面的研究工作。Prof.Revol 便答應將來可介紹我到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化學療學實驗室Dr.J. Trefouel (Chemotherapy Laboratory, Institut Pasteur, Paris) 那裡去工作，較為合適。當我在一九三九年七月通過博士論文考試後，Dr.Trefouel 便允許我到巴斯德研究院去工作。可是當時歐洲風雲緊急，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我於是面臨留在法國工作還是趕緊回國這兩種途徑中作一抉擇。我想繼續留在法國會對我的學業進修有所幫助，可是如果戰爭一旦爆發，也難預測局勢會演變到何種情況。每當念及我們國家正在艱苦抗戰中，每一國民都有共赴國難的責任，我豈能置身事外？所以便決定回國為國家奉獻一點心力。

歐戰開始末裝返國

我覺得歐洲戰爭已是無法避免的事，於是趕緊預訂九月一日的船位。就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卅日離開里昂去馬賽上船。那時的法國境內真是風聲鶴唳，人心惶惶。適巧那艘郵輪正是我一九三六年來法時所乘的那艘Felix Roussel 號，我上了船，稍覺安心。當時所有乘客都擔心那艘郵輪能否在九月一日啟行。不料德國竟在八月卅一日轟炸波蘭華沙，於是法國和英國就在九月一日向德國宣戰了。既然戰事爆發，我們所乘的郵輪能否開航，確是一個問號。那時船上有中國乘客廿二人，一部分人要留在船上等候消息，一部分人卻

想下船避難，真是議論紛紛，亂作一團。我因為和船長相識，又能講法文，所以大家推我為代表向船長那裡聯繫，探聽消息。我那次回來是坐的三等艙，三人同房。豈知其中一位國人張君是從蘇聯回來，另一位是年約四、五十歲的德國人，他的手提箱裡放著各式手錶樣品，說是到香港去接洽生意。我想這一下可麻煩了，不會遇到共黨黨徒和納粹工作者？不料適時有一位德國少女來尋找那位德國乘客，經介紹認識後，她即故意離開那位德國乘客和我接近，整天寸步不離。我暗中觀察，料想她可能也是一位納粹工作者。在這樣紛亂擾攘中，有人說：船上有德國間諜，要用炸藥把船炸沉。也有人說：船上裝有軍火，敵人會來炸船，大家留在船上，簡直是死路一條。我總找好話來安慰大家。據船長說：船上有許多盟國軍官，因假期中回歐洲度假，此刻需要返防。另外，意大利雖為軸心國之一，但在戰爭初起時還保持沉默。且稍作等待，大概總有開船希望。後來終於得到消息：由四艘法國軍艦護航，郵輪決定在九月三日離港啟行。依照指示：乘客們需在夜間穿上救生衣，大家也都不敢熟睡，真是緊張萬分。等船到達蘇彝士運河口埃及賽得港（Port Said）時便將德、意、日三國乘客護送下船。我們一路擔驚受怕，直到郵船安全地過了地中海再通過蘇彝士運河進入紅海時，才算避開了戰事的威脅。那艘郵輪從馬賽航行四十二天，才平安抵達中國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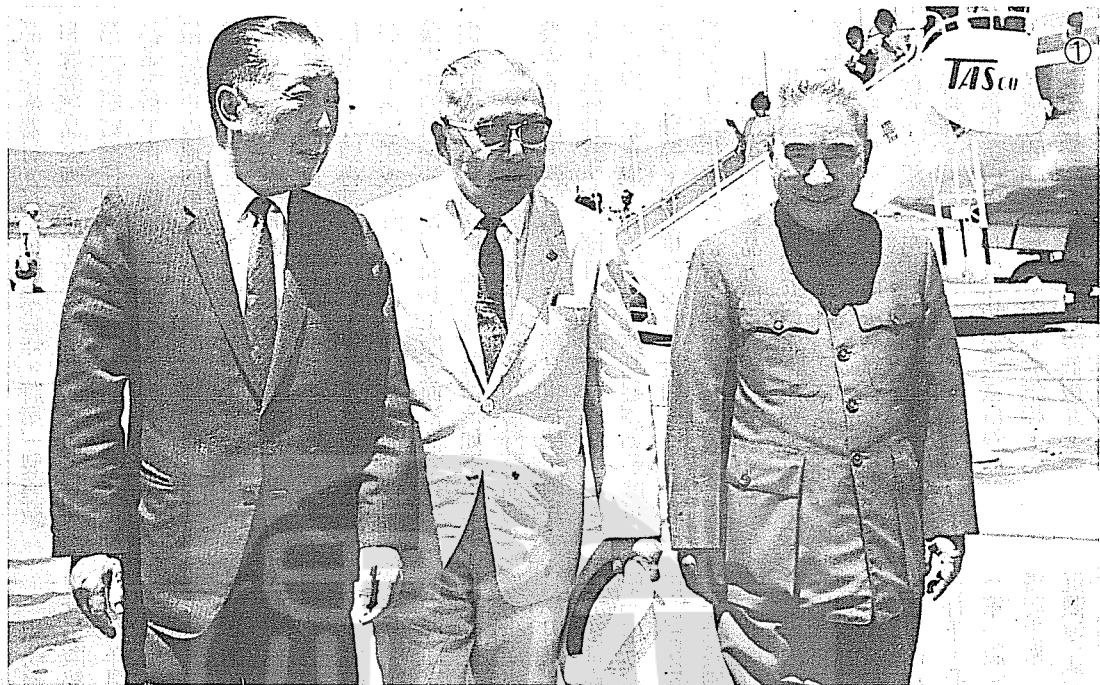
在我的一生中，常常不能釋然於懷的有幾件憾事：其一是缺少欣賞音樂的天份，每看到五線

譜就覺得頭痛，也不會辨別音調，音色，成了一個對音樂方面的聾者。其二，早年對於書法繪畫頗為愛好，可惜後來在求學過程中，由於功課忙迫，竟然荒廢了對書畫的持續學習，可算是一種心靈上的重大損失。其三，在獲得博士學位，學業告一段落後，未能再繼續進修五年十載，俾在學識方面較有成就。尤以受了歐戰局勢影響，未能進入巴斯德研究院工作，引為終生憾事！不過，假如真能進了巴斯德研究院，那我的後半部歷史便得重寫了。

任衛生署製藥工作

民國廿八年十月我從法國回到上海以後，先幫助同班同學朱文馨學長創辦光明製藥廠。光明藥廠從事研究發展製備磺胺及碘奎林（Chinofoliodoquinoline）幾種原藥和一般常用藥品錠劑及注射劑等。正當藥廠謀求發展時，我因中法大學藥科要我回去任教，祇好離開光明藥廠。在中法大學藥科任教是我對母校中法大學的一種回饋。那時宋梧生老師還擔任藥科主任，我又有機緣時親宋梧生教授的德澤，也頗感欣幸。當然恩師對我，也較我學生時代更為親切。

在中法大學藥科任教一年後，衛生署署長金寶善便來電報徵召我到後方四川去服務，擔任衛生署第一製藥廠和麻醉藥品經理處的製藥工作。當時國民政府撤退到四川，以重慶為戰時首都。衛生署設在重慶附近新橋的地方。戰時政府編制緊縮，原來的衛生部簡縮為行政院衛生署，藥政仍由醫政處兼管。另設藥品檢驗室檢驗藥品，



①作者民國三十六年來台拜會台灣省主席魏道明（左），圖為魏道明與孫科（中）鄭彥棻（右）合影。

②作者孫雲燾博士在亞洲藥學會議中贈獎傑出醫藥學家的圖照。



藥品供應處統籌供應地方醫療機構和民間所需藥品及醫療器材。為避免敵機轟炸，將第一製藥廠和麻醉藥品經理處設在嘉陵江上游的合川。我在第一製藥廠擔任副廠長，兼麻醉藥品經理處技正都是技術工作。戰時物資缺乏，經濟困難，我們儘量利用內地的資源，在簡陋的機械設備下，竟然製造了近百種原藥和製劑，對前後方醫療藥品的需求，勉力做適量的供應。尤以麻醉藥品和一般化學療劑，以及消毒藥品對於病患止痛和救治傷患，格外顯得重要。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克服了許多困難，製成當時迫切需要的好些藥品。像製藥需用的氫磺酸，還是向兵工廠方面洽商才得到供應的。現在且約略敘述當時製藥情形如下：

製藥工作的重點特別重視醫療用麻醉藥品的裝備和供應。當時製造的麻醉藥品也括藥用阿片粉，全阿片素，鹽酸嗎啡，鹽酸阿朴嗎啡，燐酸可待因，狄奧寧，和多種麻醉藥品製劑如鹽酸司卡因注射劑等。製備可待因時，改用三甲基苯胺為甲基化劑便提高製造得量甚高。

關於製備普通藥品方面：

用乙醯苯胺經氫磺酸及氨水作用製成胺基苯磺醯胺 (Sulphonamide)，乙醯磺胺 (Sulfacetamide) 等。用氯氣與汞蒸氣直接作用製成切化高汞 (昇汞)；另法製成切化低汞 (甘汞)，氧化汞等。

用消化蛋白與氧化銀作用製成蛋白銀。
製成外用硝酸銀棒及眼用硫酸銅棒。
製成檸檬酸鐵銨及含糖碳酸低鐵丸。
用煨白雲石，硫酸演製成硫酸鎂；另法製成

氧化鎂，碳酸鎂，氫氧化鎂等。

用鉍礦砂冶煉成金屬鉍，再製成次碳酸鉍，沒食子酸鉍。

用羊乳發酵製成乳酸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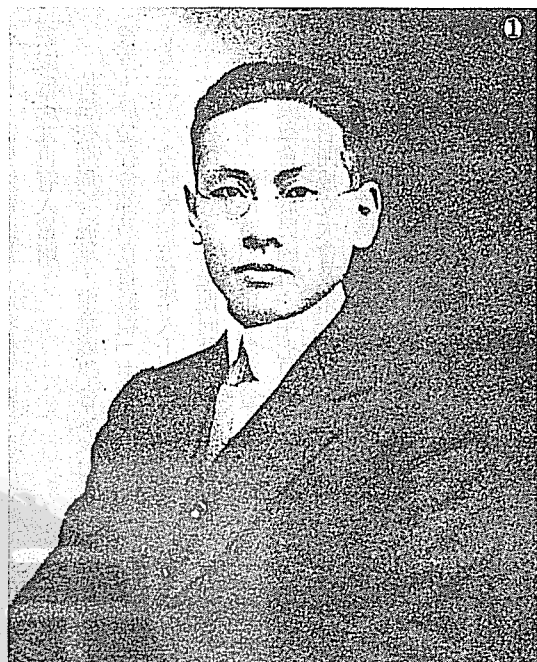
將粗硫黃經昇華製成昇華硫，精製硫黃，沉澱硫黃。另製成多種普通藥品如：精製氯化鈉，檸檬酸鈉，鞣酸，沒食子酸，鞣酸蛋白，醋酸鉛，精製白陶土，甘油燐酸鈉，咖啡鹼苯甲酸鈉，葡萄糖酸鈣，諾司卡賓 (noscarpine) 等。

在戰時簡陋環境下，從事藥品製造 (包括麻醉藥品)，我們都沒有警備，居然能保持著極度的安全和充沛的生產力，真是不可思議！我們祇能說這是受了抗戰精神的感召，大家齊心協力，努力生產報國吧！

因為製備麻醉藥品，所以對於製藥程序和管理方法都規定得特別嚴格。那時可謂已經部分實施「優良藥品製造規範」(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 的規定。我們還採用「工作競賽制」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增加生產量。實際上這種「工作競賽制」是效法蘇聯的「史丹哈諾夫運動」(Stenhanoff Movement) 而來。執行辦法是由每一工作單位就他的現有的人員，設備所得的生產量作為標準，然後視次一階段生產量的增減以評估工作成績。在戰時物質貧乏條件下，我們還能保持所有製品都符合中華藥典 (第一版) 的規定，也是難能可貴的事。我還記得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件：那是我們用室外三個沉澱池作業，從煨白雲石、鹽滷 (四川自流井副產品，其中含有氯化鎂) 製成的硫酸鎂品質優良，完全符合中華藥典的規定。可是將產品送到衛生署藥品檢驗室檢驗時，卻經判定為不合格。經探詢後才知道藥品檢驗室 (主持人是華僑馬基華博士) 係依據美國藥典檢驗，確認硫酸鎂的含量 (純度) 和其他項目都符合規定，祇是雜質檢查氯化物限量超過規定。於是我們便向衛生署申復：「第一製藥廠所製硫酸鎂品質精良，符合中華藥典規定。衛生署檢驗藥品，自應以中華藥典為準。茲以引用美國藥典作為檢驗依據，判定本廠所製硫酸鎂品質不符規定，於法不合，請准予糾正。」結果我們獲得勝訴。另有一次，我到衛生署公洽，得悉國外捐贈署方顯微鏡廿架，我即簽請撥給藥廠顯微鏡一架以資應用。卻未得到副署長沈克非氏准許，他說這是人家指定送給醫院的，不能撥給你們。於是我便去見金寶善署長，說明藥廠做藥品的品質管制工作，切需顯微鏡的理由。結果金署長便批：「准借用一架。」我帶著那架得來不易的顯微鏡回合川，大家都很高興。於是合川和新橋方面的人都傳言：「孫雲燕技正的品牌子很硬。」這不能當真，祇可視為笑談罷了。

嚴格管制囤積藥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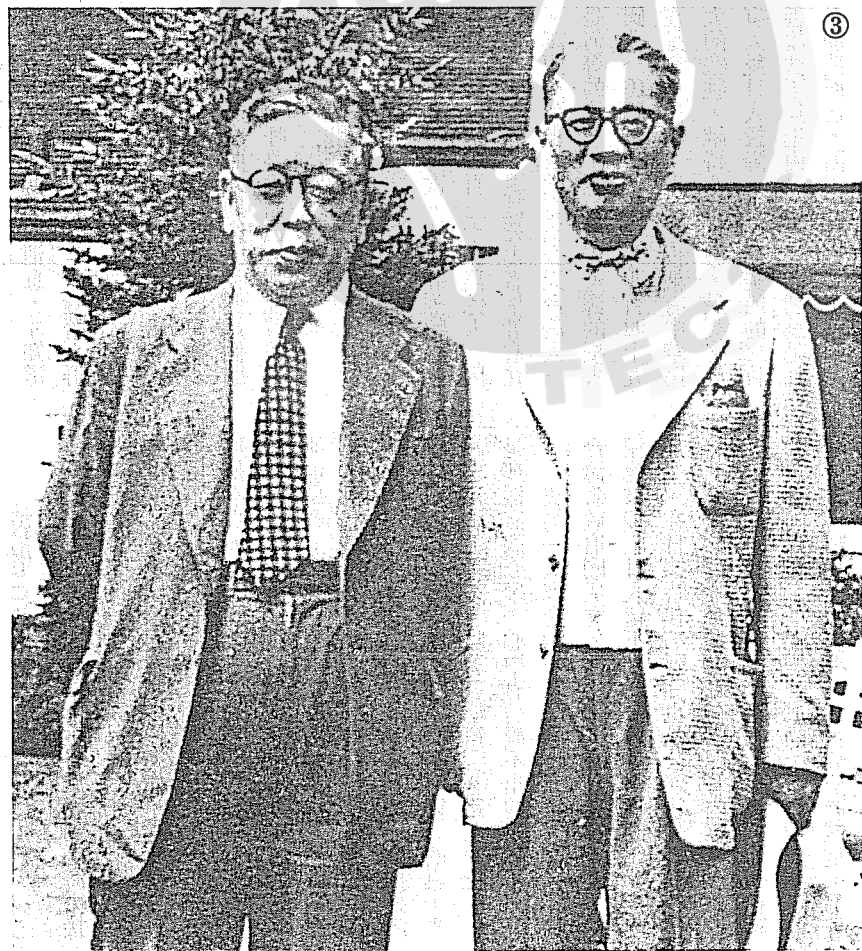
我從繁華的上海來到戰時四川合川的鄉間，生活環境的轉變，可謂懸殊甚大，真是天壤之別。我在藥廠裡有一小間辦公室，那也是我的起居室、臥室，包括衣櫥和行李儲藏室都在內。晚間把兩張長形木椅拼起來便是一張臥床。食米裡面含有秀稻米粒和砂粒形成所謂「八寶飯」，必需



① 抗戰勝利出任衛生部長的周詒春博士。

② 周詒春老年的照相。

③ 抗戰前任衛生部長的劉瑞恒（左）與宋子文（右）合影。



經過挑選之後才能下鍋。所幸合川是三江合流的地方，平時還能買到魚類和豬肉，這比重慶和其他地方要強多了。四川出名的小吃是牛肚火鍋、小籠粉蒸排骨、粉蒸肥腸。平時朋友小聚，也祇說請吃「豆花」，那豆腐腦加辣油作料，趁熱吃來也別有一番風味，是為戰時價廉味美的餐食。

戰時生活艱困，外來物資價格高昂，一般人常以囤積藥品圖利，尤以「九一四」(No.9 Salvarsan)和奎寧丸最為大家所矚目。更以奎寧丸糖衣遇溫，遇熱易於融化變質。竟有香港商人把奎寧丸加上厚層臘衣以保藥丸糖衣不致融化。結果許多人吃了奎寧丸卻整粒的排洩了出來。戰時衛生署僅掌握著少量的青黴素(Penicillin)，所以嚴格管制使用。因此，磺胺胺藥品(Sulfadiazine)便很受重視。許多人營養不良，面有菜色，需要鐵劑滋補，連我們藥廠生產的含糖碳酸低鐵丸也有人搶購。

抗戰初期局勢混亂，中華藥學會未及遷往大後方，於是社會部乃宣布撤銷「中華藥學會」的立案登記。當時大後方藥學人士都認為確有恢復藥學會組織的必要，於是便向社會部陳情。直到民國卅一年，始准改以「中國藥學會」名義立案。中國藥學會便於民國卅一年七月五日假重慶市廣播大廈召開成立大會及第一屆年會。

中國藥學會雖為中華藥學會的延續，但因更換名稱，所以中國藥學會的成立日期自應由民國卅一年開始計算。到了民國八十一年已屆五十年週年了。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四日我因公出差在重慶，

晚間和朋友在一家餐館用餐，餐後忽然聽到街上人聲鼎沸，原來是美軍方面傳來的消息，才知道日本無條件投降了。我們走出餐館，跟著人群走向都郵街精神堡壘前，看見人山人海，大家只知道高興，卻無法表達出狂歡的形態來，祇有人在歡呼：「抗戰勝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卻沒有人唱什麼愛國歌曲來助興。我們幾個朋友祇有手拉著手跟著歡呼跳躍而已。那晚真興奮得無法入睡！

在八年抗戰中，我國所受損失慘重。據可靠資料統計：總計大會戰廿二次，重要戰鬥一千一百餘次，小戰鬥三萬九千餘次。國軍壯烈犧牲者，僅陸軍官兵陣亡的就有一百三十二萬餘人。因烽火遍地，民衆遭受轟炸、殺戮死傷者估計當在二千萬以上。試想這死傷人數竟為今天台灣人口的總數，這是何等的慘痛！至於財產資源的損失，估計約為國幣(民國卅四年幣值)四百四十九億餘元，實在是創痛深鉅！世界上也祇有中華民國能以此巨大的犧牲，維持八年抗戰，最後終於獲得勝利。有人說日人投降，得助於美國的二枚原子彈。這種說法不無理由，但是僅能認為是加速日軍的早日崩潰而已。因為中日戰爭延續到民國卅四年，日軍在中國大陸已成強弓之末，陷在中國戰場泥沼中，已經無力自拔，早已註定其敗亡的命運了。我們要敬佩先總統蔣公介石的睿智和勇氣，退守四川，保衛大後方，堅持抗戰到底。全國軍民一致犧牲奉獻，付出最高代價，才獲得勝利，讓我們的國家恢復了獨立自主的地位，也使台灣光復重見天日。

接收日人留下鴉片

民國卅四年十二月底衛生署派我到上海去接收敵偽留下來的第一批麻醉藥品並對第一製藥廠和麻醉藥品經理處遷回南京預作準備。當我踏上飛機由重慶飛往上海時，真是疑在夢中，不能相信那是事實。我一到上海就去拜望上海市衛生局長俞松筠氏。俞氏在戰時擔任衛生署醫政處處長。他也是到上海接任不久。故人相見格外歡欣，我請他到上海靜安寺路來喜飯店用餐。那家餐館在戰前是納粹在上海的大本營。我還特地跑到外灘華懋飯店去，在餐廳裡選了一張靠窗口的桌子坐下來喝著下午茶。隔著玻璃窗看著路上的行人還是那樣熙熙攘攘，心中有著說不出的感觸！

我第一次來台灣是在民國卅六年三月，那時台灣省政府剛成立。衛生部部长周詒春(註一)派我來接收日人留下來的數約計六噸的鴉片(阿片)。在日據時代，阿片也是公賣物品之一，是將五公克的阿片膏裝在紅色的錫管內名為「福煙」，配售給登記的煙民。接收的那批阿片包括阿片土、阿片膏，「福煙」成品，還有抽提剩下的阿片渣。阿片土經儲存日久水分蒸發減重，另外阿片渣被白蟻咬食也失重。前台灣長官公署準備移交阿片時，發現重量減少，認為衛生局經管那批阿片的顏姓藥師有監守自盜嫌疑，於是經由法院將顏姓藥師羈押在監獄中。我來台灣時，曾謁台灣省主席魏道明，那時衛生處處長是顏春輝，第一科科長是許子秋(後來擔任衛生署署長)，顏春輝原在南京中央實驗醫院擔任技正，也

是來台不久新任衛生處處長的。分別和他們直接間接作了聯繫協調溝通，我設法解決阿片失重這項棘手問題，順利完成接收工作。最後我們租了兩架中國民航公司（CAT）飛機把這批阿片直接運回南京。

民國卅七年八月衛生部派我第二次來台灣調查金雞納（Cinchona）種植情況。按日據時代日人在台灣中南部山區試種金雞納樹。迨台灣光



作者孫雲燾教授近影。

復後，台灣醫療物品公司即大量砍伐金雞納樹，剝取樹皮提製奎寧（Quinine 抗瘧藥品），但不做撫育和培植工作。如此情形繼續下去不數年間，金雞納樹勢將被砍伐殆盡。衛生部卻認為金雞納樹種植事業關係我國抗瘧及國民保健工作甚鉅，於是派我先來台灣調查金雞納種植情形，再謀整頓方法與途徑。我來台後便會同台灣醫療物品公司人員組隊前往台中央山脈，高雄旗山，台東大武山脈各區農場作實地調查，歷時四十多天，進入深山，攀登高嶺，一路人馬浩浩蕩蕩，真像探險隊一樣。在調查工作告一段落後，便邀集台灣省農林處、林業試驗所、林產管理局、台大農學院、台大森林系、省衛生處、台灣醫療物品公司、中國藥學會台灣省分會等機構各派代表舉行座談會二次，聽取各方意見，擬定「台灣金雞納種植事業整頓方案」呈報衛生部核定後轉請善後救濟總署予以補助。惜因時局劇變，此項整頓方案未能實現，深覺可惜！

籌組亞洲藥學協會

我於民國卅八年隨政府遷台，仍在第一製藥廠及麻醉藥品經理工作，惟政府緊縮編制，原衛生部於卅八年五月改為內政部衛生署，卅八年八月又改為內政部衛生司，這可算是自民國十七年衛生部成立以來，中央衛生機關簡縮到最小單位的一個時期。後來到民國六十年三月才又恢復為行政院衛生署。中國藥學會於卅八年遷來台灣。鑒於抗戰時期，前中華藥學會因未能及時遷往大後方，以致遭受社會部撤銷立案登記處分，所以

我來台時，乃以中國藥學會理事身分特將「中國藥學會」的印信攜帶來台，呈報內政部核准登記，再由內政部另行頒發「中國藥學會」印信（即現時所用印信）供用，於是中國藥學會乃經政府合法登記，繼續推展會務。惟該時原任理事來台人數不多，於是遵照規定即時組織可選委員會以通訊投函方式選舉第五屆理事九人，監事三人。

中國藥學會遷台後即與台灣省分會聯合推展會務，除提倡國內藥學研究發展外，並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中國藥學會於一九五八年加入國際藥學協會（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Pharmaceutique, F.I.P.）為正會員，並於一九六四年發起籌組亞洲藥學協會（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 FAPA）。民國六十三年及七十三年曾兩度在台北舉辦亞洲藥學科技會議，成績卓著，備受各方讚許。我現在仍任亞洲藥學協會副會長。我因熱心藥學會會務，曾被陸續推選為理事長多年。當民國七十六年我向藥學會理事會請辭理事職務時幸獲通過，但復蒙推為名譽理事長。我原想藉此能獲得全休，不料仍藕斷絲連。我在藥學會曾主力推動許多事情，如促進中華藥典的二次編修，和提倡藥學教育，雖亦見若干成效，但付出的辛勞也確實不少。（未完待續）

（註一）周詒春字寄梅，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後任校長，抗戰勝利後出任衛生部長，一九五八年在大陸病逝，時任貴陽清華中學董事長。